

影响的焦虑

——论当代中国文论对西方文论的接受

赖大仁

内容提要 在当代中国文论变革发展的进程中，对西方文论的引入和接受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带来了“影响的焦虑”问题，这在“中国文论失语症”、文学“终结论”和“反本质主义”“强制阐释论”等话题的讨论中表现得较为突出。其表层原因在于中西文论之间地位与影响的不对等，深层根源则关涉对中西文论的先进性与落后性、异质性与同构性的认识，以及当代中国文论的创新与借鉴、继承关系等问题。如何走出“影响的焦虑”？一是在理论反思中找到并确立当代中国文论的主体性，重铸当代文论应有的主体精神；二是从百年中国文论所追求的“现代性”走向新时代所应建构的“当代性”，以此为根本确立当代中国文论创新建构的理论基点；三是进一步深入研究中西文论的异质性与同构性问题，找到向西方文论学习借鉴和异质互补、异质同构的契合点；四是着力解决一个“化”的问题，真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 影响的焦虑；当代中国文论；西方文论；异质互补；异质同构

当代中国文论的变革发展，是一个破、引、建三者交织互动不断推进的过程。其中“引”的方面，即对外国文论尤其是西方文论的引入和接受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它是破除各种旧的文学观念和文论模式的一种借用工具；另一方面，它也是探索建构新的文学观念和文论形态的一种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然而在我们对西方文论引进与借鉴的过程中，显然并不只有被动接受与吸收，同时也不无思想观念上的矛盾冲突，引起了各种质疑与争论，从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焦虑”。“影响的焦虑”原本是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提出来的一个理论命题，指西方诗学中的一种现象：一些后辈诗人一方面要向前辈大师们学习，受到过去强大诗歌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些后辈诗人又难以摆脱前辈影响、难以超越前人，因而感到压抑和焦虑，于是采取各种有意“误读”的策略来摆脱这种影响，以求克服焦虑情绪，从而寻求突破与创新之道^[1]。在当代中国文论对西方文论的引入与接受中，实际上也存在类似情形。朱立元在探讨当代中国文论发展演进问题时，就谈到“西方思想

文化的大量引入，也在中国学界产生了‘影响之焦虑’”，只不过他并未对此问题展开具体论述^[2]。笔者拟在此接过这个话题，对当代中国文论受到西方文论影响，何以会产生“影响的焦虑”，以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焦虑、应当如何走出这种焦虑等问题，进行一些理论探讨。

一 从引进与接受的欢欣到“影响的焦虑”

从历史上看，我国近现代国门打开之后，曾经有过对外国文学与文论的大量引进和接受，引起了关于“全盘西化”与民族化问题的争论。20世纪50年代“以苏为师”时期，曾经全面引进和接受苏联文论，也对我国当代文论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真正大规模、全方位地引进和接受外国文论尤其是西方文论，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情。

新时期之初，主要是引入和讨论现代派文学及其文论，到了80年代中期，骤然兴起了文学研究方法论热潮，大量译介和阐释各种各样的西方文学

研究方法，并尝试将这些十分新奇的文学研究方法运用于文学研究实践，从而改变了我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面貌。由此进入到对西方文论更为全面深入的引介、阐释、研究和借鉴吸收，各种西方文论著作、教材、文论史或文学批评史，以及各种国别、各种流派、各种“主义”的文论，也都以各种译丛或研究丛书的形式纷至沓来。经过一段时间消化吸收之后，80年代末以来，随着各种新编文学理论教材的出现，一些我们过去所陌生的西方文论话语便进入到新的文论话语体系中来，与以前传统的文论话语交织融合，开始改变我国当代文论的整体面貌。当代文学理论观念变革也影响到各个方面的文学研究，包括中外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研究与评论，各种文学史的重新编著以及“重写文学史”的讨论等，显示出文学界前所未有的兴奋与活跃。随着新时期改革开放不断推进，我们追踪西方文论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时间差距也越来越短。如果说新时期之初主要还是关注和引介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现代主义文论，那么到了90年代，我们的研究和引介就已经赶上了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对当代西方文论的最新发展，几乎就是在同步跟进和引介研究，对此文论界已是习以为常了。

我们对西方文论的引进与接受，在思想认识和情感态度上，不同阶段显然也有比较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过去我们自我封闭太久，对外面世界的新东西所知甚少，对外开放之后，名目繁多的西方文论知识让我们眼界大开，耳目一新。同时，我国当代文论要走出旧观念、旧模式，寻求变革，也的确需要某些外来理论资源的参照与借鉴，西方文论的引入便恰逢其时。因此在当时情况下，文学界对西方文论的引入和接受普遍表现出一种兴奋和欢欣的情绪。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几乎是生吞活剥的引介和搬用之后，学界又对西方文论大行其道而本土话语被严重挤压的现象感到困惑和失落，由此产生如上所说“影响的焦虑”。这种焦虑情绪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通过某些理论话题的讨论表现出来。在笔者看来，从90年代至今大致有三次不同理论话题的讨论，比较集中地表现出这种“影响的焦虑”。

一是90年代中期兴起的“中国文论失语症”话题的讨论。有学者认为，自20世纪初以来，我国文学和文论界一方面过于激烈地反传统，另一方面则大量引进西方文论或苏联文论话语，导致我国现当代文论越来越“西化”或“苏化”，越来越失去我们自己的文论话语。这种情况到了新时期以后显得更加严重，随着西方文论被源源不断引入，乃至形成外来文论话语独霸文坛的局面，如今，“这种‘失语症’已经达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致于我们不仅在西方五花八门的时髦理论面前，只能扮演学舌鸟的角色，而且在自己传统文论的研究方面也难以取得真正有效的进展”^[3]。这种中国文论“失语症”的判断，很快得到学界广泛呼应，不少学者纷纷加入到这个话题的讨论中来，一时形成了不小的声势。

“失语症”话题的讨论，一方面指向对全面引入西方文论话语的质疑和反思，另一方面则引向如何摆脱西方文论的强势影响而重建当代中国文论的探讨，于是引出了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问题的讨论，这吸引了更多学者特别是古代文论学者的参与，他们设想主要通过对古代文论资源的发掘和转化来重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从而改变当代文论过于受到“西化”影响而“失语”的局面。在这场讨论中，也有学者阐述了不同看法，认为我们的古代文论传统虽然独具特色，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比较缺乏现代性文学精神，难以适应中国社会文化和文学现代转型发展的要求，因而引进和借鉴外国包括西方文化和文论是有必要的，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如果没有这种引进和借鉴，就不可能有20世纪初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论的现代转型发展，因此不能把这种借鉴吸收简单说成是“失语”。如果我们能够对此进行比较全面和辩证的反思，就应当说这种引进和吸收是有得有失，总体而言还是得大于失，问题只在于我们怎样来进行认识总结。这场讨论如果仅就“失语症”的争论而言，其实并没有什么结果，但它的确反映了我国当代文论界面对西方文论的强势影响而产生的普遍焦虑，能够引起对西方文论的引进和接受的自觉反思，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它引出了“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问题的探讨，把发掘和激活传统文论资源纳入到当

代文论建设中来，这显然具有更为积极的作用。

二是紧随其后而来的关于文学“终结论”和当代文论“反本质主义”问题的讨论。文学“终结论”本是美国解构批评家希利斯·米勒等人到中国讲学带来的话题，认为不仅文学而且包括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都将在电信时代走向终结。这种观念一经传入，便引起我国当代文论界的强烈反应，许多人一时难以接受这种解构主义理论观念，提出质疑和进行反驳，努力维护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积极意义与地位。当然也有另一种意见，认为由于现代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革，以及经济文化全球化扩张的必然趋势，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和文学研究确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危机，我们需要面对这种新的现实，研究新出现的问题，而不只是对这种理论观念消极地加以排斥和抵制。

这种争论的展开和推进，到新世纪之交则又转换为更具有冲击力的当代文论“反本质主义”问题讨论。反本质主义在西方学界本来就是一种解构主义哲学观念，主要针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强大传统，力求破除过去的本质主义理论观念和思维方式，走向相对性和多元开放的理论探索。这种理论观念表现在当代文论和文学研究中，则是通过对文本中心论和文学本质论观念的解构，把文学研究从以往画地为牢式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为走向更加广阔宽泛的文化研究开辟道路。反本质主义理论观念的引入，带来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反思与检讨，认为过去的文学理论，包括新时期以来重新建构起来的文论，都没有摆脱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和理论模式，需要继续加以破除和重建。这种主张得到一些人的支持和呼应，也引起了许多人的焦虑不安，认为如此照搬西方理论观念，不分对象、不加分析地贯彻反本质主义，将会导致对自身文论传统的全面颠覆，不可避免地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由此便引起了各种观点之间的激烈争论，从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当代文论界的焦虑乃至焦躁的情绪。如果说“失语症”讨论所涉及的问题，还只是西方文论话语的渗入式影响，那么，从“终结论”到“反本质主义”讨论，则关涉西方文论所带来的具有极大冲击力的解构性与颠覆性影响，涉及文学理论观念的根本性冲突，由此引起的不仅是更深的焦虑，而且还是一

定程度的排斥与抵制。

三是近年来出现的关于“强制阐释论”的讨论。这一讨论具有更明确的针对性，即主要针对近半个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文论的消极影响，对此进行批判性反思。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西方文论以文本中心论为主导，那么此后便开始打破这种封闭性格局，从文本中心论的文学研究转向了不断扩张的文化研究，使得原来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演变成更为时兴的文化理论。不仅如此，文化理论形成声势之后，便成为一种“理论中心主义”，各种宏大的文化理论似乎无所不能，可以主宰和随意裁剪各种文化和文学现象，各种名目的文化理论都可以用来对文学进行强制阐释，这就在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局面。这种文化研究转向趋势也对我国当代文论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样带来了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文学理论向文化理论的转向，使得既有的文学研究不知所措而陷入困境，这不能不再次引起文学和文论界的困惑与焦虑。

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当下，我们面临一个难以解脱的悖论：一方面是理论的泛滥，各种西方文论轮番出场，似乎有一个很‘繁荣’的局面；另一方面是理论无效，能立足中国本土，真正解决中国文艺实践问题，推动中国文艺实践蓬勃发展的理论少之又少。中国文艺理论建设和研究渐入窘境。我们必须深刻反思：究竟应该如何辨识当代西方文论？它对中国文艺实践的有效性如何？在西方文论的强势话语下，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方向和道路何在？”^[4]根据这种判断和思路，论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强制阐释论”和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重建问题，前者主要指向对当代西方文论根本缺陷的辨识，后者则指向对当代中国文论如何摆脱西方文论的不利影响而走向重建的探讨。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参与这个话题的讨论，当然也表现出各种不同的认识见解，对当代西方文论的利弊究竟如何认识，对这种文化研究理论形态的接受及其带来的影响究竟如何反思和评估，也都各有看法，争论甚多，未必能形成普遍共识，但由这种讨论反映出来的“影响的焦虑”仍然是真切的，甚至更为强烈。

实际上，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论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几乎都受到西方文论影响，如果说在改革开放

初期这种引进和接受不可或缺,那么时至今日,我们是不是还有必要亦步亦趋地跟着西方文论的步伐走?是不是需要更多地思考如何走自己道路的问题?与前两次相关话题的讨论相比,这一次对西方文论的弊端及其影响的质疑与反思,显然更具有挑战性,也更表现出理论的反思与自觉。

二 “影响的焦虑”根源何在

如果如上所说的现象确实存在,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何以会产生这种“影响的焦虑”?以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焦虑?在笔者看来,也许可以从表层与深层两个层面来分析。

首先,从表层方面来看,这种焦虑源于中西文论之间地位与影响的不对等性。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西方文论被大量引入,越来越居于强势地位,形成强势影响和强大的压力。这种影响和压力几乎无处不在,文论界普遍流行的总是那些被源源不断翻译引进的西方文论著作,文论家们乐此不疲地谈论的也总是那些西方文论大家,许多学术会议所讨论的多是与最新西方文论有关的热门话题,我们的文学研究包括从古代、现代到当代的文学与文论研究,也都往往要引入西方文论的观念与方法才能有所创新。但是,我们在如此引入和接受西方文论的时候,又总是充满了矛盾。对西方文论的发展走向和最新动态我们不能不关注,不能不引入并讨论,不能不受到它无处不在的影响,但我们又似乎摆脱不了本能性的民族自尊感,并不总是甘心于被动地跟在西方文论后面讨论问题、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跟与不跟、引与不引、接受还是不接受,都无不感到矛盾、困惑和焦虑,前面提到的许多现象,应当说都是这种矛盾与焦虑情绪的表现。

其次,从更深层方面来看,“影响的焦虑”还不只是一种情绪反应,实际上还关涉思想认识或理论观念上一些根源性的问题,笔者以为主要关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关于中西文论的先进性与落后性的认识问题。这个问题自近现代以来一直让国人纠结不已,五四时期就引起了很大争论。不过基于中国社会文化

从传统到现代转型发展的总体认识,多数人还是认为我们已经落后于西方,应当向西方文化学习借鉴,这种落后不仅是时间性的落差,同时也是文学形态和艺术方法、理论观念与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距。

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这种中西文学与文论发展的落差重新凸显出来,我们发现西方文学与文论已经由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而我国文学却还停留在传统现实主义阶段。基于这种现状便要急起直追,把现代主义作为更先进的文学观念与方法来学习借鉴。然而如此追逐了一段时间之后,到了90年代中期,学界便有所醒悟,一些学者认为,未必可以断言西方文论先进而中国文论落后,事实上可能正好相反。季羨林针对“失语症”问题讨论时就说:“我忽然得到了‘顿悟’,觉得东西方文学有极大的不同。专就西方文学而论,西方文论家是有‘话语’的,没有‘失语’;但一读到中国文学,我认为,患‘失语症’的不是我们中国文论,而正是西方文论。我们中国文论家必须改弦更张,先彻底摆脱西方文论的枷锁,回归自我,仔细检查、阐释我们几千年来使用的传统的术语,在这个基础上建构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然后回头来面对西方文论,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加以分析,取其精华,为我所用。”^[5]季羨林关于中国文论优于西方文论的看法得到了许多人的呼应,当然也有不少人对此不以为然。

当代文论“反本质主义”问题的讨论则更直接地指向中国文论的本质主义弊端,而西方文论的反本质主义显然被认为是更先进的理论观念与思想方法,这同样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关于“强制阐释论”的讨论则反过来针对当代西方文论脱离文本实际和文学实践、理论中心主义等根本弊端,主张立足于中国文论传统和当代文学实践来重建当代文论,由此引起的争论仍然持续不断。总的来看,对中西文论的先进性与落后性或高下优劣的认识,是近百年来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始终困扰人们的一个问题,各种不同看法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这就使得面对西方文论的引进与接受时,难以避免不断反复的纠结与焦虑。

二是关于中西文论异质性与同构性的认识问题。如果说我们不宜简单化地看待中西文论的先进性与落后性,那么至少应当承认两者之间存在

着异质性，因此不能强分高下。季羨林就特别指出了中外（东西）文论的根本差异，他从语言文字和思维方式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认为中西各自有一套文论话语，这几乎是难以通约的^[6]。曹顺庆等学者也从中国文论的知识谱系与构型模式包括求知意向、求知之路等方面着眼，分析其不同于西方文论的异质性，认为我国学界多年来对中国文论的异质性问题重视和研究不够，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之一^[7]。

不过问题还在于，讨论中西文论异质性的目的何在？这里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理论观念和认知意向：一种是强调中西文论的“异质性冲突”，认为两者存在根本性差异，彼此不可通约，其结果便是比较排斥西方文论的引入和接受，认为异质性文论的影响容易破坏中国文论本身的独特性，从而导致“失语症”。另一种则着眼于中西文论的“异质性互补”，看到两者的差异虽然会带来矛盾冲突，但也恰好可以取长补短促进中国文论的变革与创新，这未必没有积极意义。对前者而言，面对无可回避的西方文论强势影响，所表现出来的抵触与焦虑情绪显然更为突出；而对后者而言，虽然总体上赞成对西方文论的学习与接受，但也有另一种困惑，这就涉及对中西文论异质同构性的认识。具体而言，既然说中西文论可以取长补短，那就应当具有异质同构的可能性，那么“同构性”的基础是什么？这就又关涉一个常谈常新的问题，就是究竟应当“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应当取什么样的“长”来补什么样的“短”？在那些“异质性”因素当中，究竟哪些东西是可以纳入“同构性”之中的？怎样进行“同构”才是真正可行而且有效的？如此等等，这些问题同样让人纠结不已，对此不能不产生困惑和焦虑。

三是关于当代中国文论的创新与借鉴、继承的关系问题。毫无疑问，对当代中国文论而言，最重要的是适应时代要求而创新发展，但问题在于，创新不可能凭空进行，需要借助一定的理论资源，以及找到创新生长的理论基点。说到理论资源，无非是两个方面的：一个是对本土文论传统的继承与革新；另一个是对外国文论资源的借鉴与吸收。就前者而言，我们实际上已经离得很远，经过 20 世纪

初以来一次次激烈的反传统，本土文论传统的影响已十分有限。近百年来，我们更多转向了对外国文论的引进与借鉴，从近现代主要引入欧美文论，到新中国成立后主要学习苏联文论，再到新时期以来全面接受外国文论，这种影响无疑十分深远。对外国文论资源的借鉴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只在于如何做到“中国化”，即真正化作我们所需要、为我所用的东西。然而实际上，我们的问题恰恰是“化”得不够，没有真正把外国文论资源“化”进来，而是直接和简单化地照搬移植过来的情况较多，跟着外国文论思潮走的现象比较普遍，其结果可能就不是我们所期望的西方文论“中国化”，而是反过来，使我们自己的文论变得越来越“西化”。这样就难免形成主观上寻求“中国化”而实际上被“西化”的矛盾冲突，正是由于这种矛盾冲突，才由外而内引起我们的普遍性焦虑。

面对这样的现实，便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另一种倾向，就是转而寻求回归传统，设想更多凭借本土文论资源的继承与革新来重建当代中国文论，于是就提出了“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命题。这种设想和思路听起来当然很好，因为中国古代文论资源十分丰富，如果确实能够做到现代转化，就可以使当代文论过于“西化”的面貌大为改观。但这里的关键问题仍然在于一个“化”字，即怎样才能做到“现代转化”，或者更加确切地说，它是不是能够“化”得过来，对此很多人都不无怀疑。从这些年来的实际情况看，学界对古代文论现代转化所取得的成效似乎并不满意，当然人们对这种理论探索的初衷和难度也都能够充分理解，而不至于过分苛求。不过，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反差，确实会加深人们的内在焦虑。还有就是当代中国文论创新以什么为理论基点的问题，这既与如上所说的“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的问题有关，也与近年来所讨论的理论中心还是实践导向的问题有关。这些问题错综复杂，似乎难以理出一个头绪，同样使人们的困惑与焦虑总是挥之不去。

三 如何走出“影响的焦虑”

按照布鲁姆的看法，某种外源性强势影响对主

体形成一定的压力，就会给主体带来“影响的焦虑”。这可能并非坏事，由此可以激发主体的反叛意识，找到某种有效办法来破除这种强势影响，从而摆脱各种羁绊，寻求自身的创新发展。对当代中国文论而言，可以说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主要不是来自传统文论的影响和压力，而是源于外来输入的西方文论的影响和压力，并且由此引起跟本土文论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等复杂关系，构成了外源性与内源性因素的交织混杂。基于上述关于何以形成“影响的焦虑”的粗略认识分析，对如何走出这种理论困境，我们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探讨。

其一，在理论反思中找到并确立当代中国文论的主体性，重铸当代文论应有的主体精神。近年来我国理论界一直都在讨论如何坚定文化自信，对当代中国文论而言，同样有一个坚定理论自信的问题。而建立这种理论自信的前提和基础，是要解决“我是谁”的问题，即重新确立当代中国文论的主体性。笔者认为，我国新时期以来文论的创新探索和理论建构有不少有益经验值得总结，比如审美意识形态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等，都是在努力吸收融合各种外来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探索建构起来的，较好地适应了时代要求，体现了当代中国文论的主体精神与理论自觉。然而90年代之后，在全球化带来的复杂多变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当代文论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主体精神弱化或迷失，一方面在大众文化潮流中显得无所适从或左右摇摆，另一方面，对当代西方文论各种新思潮缺少必要的批判扬弃，由此陷入难以自拔的困惑和焦虑^[8]。

也许可以说，导致产生“影响的焦虑”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外源性的影响压力，而在于内源性的主体身份与地位的丧失。因此，要走出这种“影响的焦虑”，就要从重建当代文论的主体性开始。不过问题在于，我们要寻求重建什么样的主体性？在前面说到的“失语症”和“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讨论中，就已经提出了以中国文论为主体或本体进行重建的主张，但实际上仍未解决根本性问题。因为他们所主张和论证的是以中国古代文论为本的主体性，这显然有很大的局限性。而我们当今所需要着力建构的，应当说是当代性的中国文论主体性，尤其需要强调面向新时代的当代性，否则就

难以真正适应当今时代的要求。由此便引出了我们下面所要讨论的问题。

其二，从百年中国文论所追求的“现代性”，走向新时代所应建构的“当代性”，以此为根本确立当代中国文论创新建构的理论基点。近百年来，在中国文论现代转型发展进程中，“现代性”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似乎也是我们始终如一追求的目标，从启蒙现代性到革命现代性，再到改革开放的现代性，其中还包括审美现代性，以及“未完成的现代性”等，都被我们理论界反复不断地讨论。如前所说，近百年来我们一直纠结于“西体中用”还是“中体西用”，这实际上是要寻找现当代文论建构的理论基点。

李泽厚曾经在“西体中用”的提法之下，阐述过这样的看法：“所谓‘西体’就是现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它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和本体意识。它们虽然都来自西方，却是全人类和整个世界发展的共同方向。所谓‘中用’，就是说这个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现代化进程仍然必须通过结合中国的实际（其中也包括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实际）才能真正实现。这也就是以现代化为‘体’，以民族化为‘用’。因为‘体’‘用’两者本是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的，从而如何尽量吸取消化外来一切合理东西，来丰富、改造和发展自己，便是无可回避的现实课题。”^[9]在这里，他巧妙地转换话题而提出“现代化为体、民族化为用”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它容易契合我们追求现代化发展的时代要求。然而问题在于，正如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一旦说到所谓现代化、现代性之类，就会自然而然地把目光转向西方，以西方文论的理论形态及其最新发展作为现代性的尺度，用以衡量我们的发展进程。这就在无形中承认了西方文论的先进性和我们自己的落后性，就意味着我们要在西方文论后面努力跟进，如果不跟进就会更加落后，而如果要跟进又容易失去自我和缺乏主体性，由此便陷入了跟与不跟的悖论和困境之中。如果说，我们过去曾经引入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等理论资源，确实起到了促进本土文论现代转型发展的作用，那么到了现在，我们已经跟进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最新发展，到了要引向文学与文学研究“终结论”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要继续跟

下去？这的确值得认真反思。

近期见到有学者对西方文论中的“现代性”概念，以及中国文论中的现代性问题进行历史梳理和理论反思，认为现代性也并非没有片面性和历史局限性，我们当今应该从“现代性”过渡到“当代性”，加强“当代性”问题的探讨和理论建构。在论者看来，“当代性也不是对现代性的彻底颠覆，而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现代性的延展和修正”，就其内涵而言，“具有‘现时’和‘瞬时性’特征的‘当代性’，却包含着历史、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维度，也具有全景式‘在场’的特征。这就是它超越‘现代性’的所在”^[10]。笔者以为，西方文论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乃至更“后”的什么理论发展，自有他们的道理，而我们既不必总是纠缠于“现代性”，总是把它与西方文论的先进性绑在一起，也不必总是追逐“后现代”，以为这就是必然的发展方向，而是可以超越出来，落到我们自己的时代性即“当代性”上面来讨论问题，找到当代中国文论创新建构的理论基点。我想这种“当代性”中最重要的内涵，就是当代文论如何切实面对和研究当代文学发展的新问题，从而回应新时代文学发展的要求。这当然是一个颇为宏大的话题，需要另做专门的探讨。

其三，进一步深入研究中西文论的异质性与同构性问题，找到向西方文论学习借鉴和异质互补、异质同构的契合点。应当看到，中西文论对文艺基本原理的认识是有共同性的，只不过各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毛泽东同志说过：“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11]比如关于文艺的情感性与思想性、艺术想象性与审美性、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特性等方面，中西文论都有相通之处。但中西文论的异质性也不言而喻，具体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近现代以来西方文论的现代性精神，如现代人本主义与人道主义，追求社会变革与人的自由解放，包括审美自由与审美解放的精神等，这种现代性应当说是我们传统文论所缺乏的。二是在思维方式、话语方式和理论形态方面，

西方文论比较重视思辨理性，讲究归纳演绎和判断推理，追求逻辑严密性和自洽性、理论的系统性或体系性、理论话语的准确清晰和内在张力，以及理论的自反性（自我反思和批判质疑）等，这与我们传统文论比较重视圆融思维、原道宗经、人生体验、艺术感悟、品味评点、诗性表达等相比，的确大不相同，可以说各有所长。三是基于中西语言和表达方式不同，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形态也差异很大，因此，对文学的艺术特性，如语言符号、形式结构、艺术表现方法等方面的认识和理论探究，显然也是大异其趣。我们对西方文论的学习借鉴，就要面对和比较彼此之间的异同。对共同性的方面，可以进行互证式的研究阐释，从而深化对文学基本原理的认识理解；而对异质性的方面，则既要看到彼此之间的冲突，更需要研究如何达到异质互补的可能性。

这里的关键在于异质互补和异质同构的契合点何在？在文论精神方面，从五四时期以来，我们都是以中国化的“现代性”精神作为现代文论转型建构的理论基点，在此基础上转化古代文论资源和吸收外国文论资源，彼此融合同构而实现创新性发展。时至今日，则需要进一步转向“当代性”理论建构，深入研究这种“当代性”的精神内涵与特质，重构当代文论创新发展的现实基础，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如何对西方现代到后现代理论进行批判扬弃与吸收融合的问题。而在理论形态、话语方式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总的来说也还是要以现代知识与理论形态为基础和契合点，而不可能回归古典形态。我国现当代文论经过近百年来融合中西文论资源而转型发展，已经形成现代知识和理论形态及其传统，中西文论的异质性差距远没有百多年前那么大，在当今全球化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中外文学发展趋向和艺术经验也应当具有更多的趋同性。因此，我们不必过于强化异质性的方面，而是更多看到趋同性或同构性的方面，可能更有利于克服焦虑情绪，推进当代文论的创新性发展。

其四，如何着力解决“化”的问题，真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无论是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还是西方文论中国化，其实关键和难度都在一个“化”字。前者暂且不论，仅就后者而言，这里所谓“化”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指过程，即把

一些我们需要的西方文论通过译介和阐释引入进来，这在一定阶段内有一些简单化的移植照搬和模仿套用并不奇怪，不必过于焦虑和苛责；另一个是指消化即“化入”，真正化为我们自己的创新创造。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12]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论的转型发展进程中，我们对西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的接受与转化是有成功经验的。新时期以来我们对西方各种现代派文学与文论的接受与借鉴也应当说很有成绩，现实主义理论重建以及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主体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等理论建构，也包含了中西文论的交织融合与创造性转化。还有我们引入西方的叙事学、图像学、符号学、生态学、存在论、阐释学等之后，也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创造性转化工作，努力跟中国传统和经验相结合，将之转化为我们的本土话语和问题，力求创建中国叙事学、中国阐释学等。当然，在这个“化入”的过程中，会出现如布鲁姆所说的各种有意或无意“误读”和“修正”的现象，也会出现我国学者所说的各种“变异”现象，如流传变异、阐释变异和结构变异等^[13]，如果我们能够从文学接受理论和比较文论“变异学”的角度深入探讨，应当说也是很有意义的。问题只在于，任何外国文论的接受与“化入”，都应当基于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必要选择，也意味着我们需要经过自己的理解与阐释，才能更好地实现创造性转化。这方面既有过去的有益经验可以总结，也有一些新的问题值得探讨。

总的来看，我们对西方文论的接受和借鉴，至今仍会让人不时感到困惑和焦虑，原因可能在于：一是对西方文论简单照抄照搬、盲目追逐和借机炒作的现象，把文学作品和文学问题强按在某种西方文论模式中强制阐释的现象等仍然存在，容易搅动浮躁的学术风气而让人焦虑不安；二是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在引入文学终结论、解构主义、反本质主义等理论之后，过于受到其中消极因素的影

响，偏重于对当代文学和文论发展的怀疑性、解构性反思，而基于积极反思的创新性理论建构则显得不足，跟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形成较大的反差，这也让人感到焦虑不安。因此，对西方文论的接受，最终还是取决于立足本土文论创新发展的创造性转化。如果我们不能将前一时期的怀疑性、解构性反思，转化为积极的、建设性的理论建构，那就可能仍然走不出“影响的焦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40年文学理论问题论争研究与文献整理”(项目编号19AZW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参见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之“绪论”部分，徐文博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

[2] 朱立元：《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演进与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

[3] 曹顺庆、李思屈：《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4] 张江：《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析——兼及中国文论重建》，《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5][6] 季羨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

[7] 参见曹顺庆等《中国文论的“异质性”笔谈》，《文学评论》2000年第6期。

[8] 参见赖大仁《重铸新时代中国文论主体精神》，《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

[9]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317—318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0] 丁帆：《现代性的延展与中国文论的“当代性”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11][12] 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第15页、第22页、第2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版。

[13] 曹顺庆、夏甜：《变异学与他国化：走出东方文论“失语症”的思考》，《文艺争鸣》2020年第12期。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当代文艺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何兰芳